

與電腦專家唐同誥先生交流



這場疫情讓大家的身心都成長不少，我有機會在家看書學習，有機會與搞科研的唐同誥先生交流，我明白了宏觀看一個國家軌迹是指：從政治、經濟、科技和文化來看一個國家的強大與否。

我在2013年11月的一天，認識了一位匹茲堡的讀者，他從上海來美國近30年了，他說如果華報有興趣可以報道他最近寫的一本新書《繪製進程圖》D++ 語言教程，他說他是上海人，已經73歲了，很想把他的學術研究成果傳給大家，他就是1986年來美國匹茲堡大學求

學的華人唐同誥先生，時間真快，一晃過了7年。

唐同誥1968年在上海復旦大學開了計算機工廠，那個時候他的計算機工廠很賺錢，學校各個教研組都來他這里要錢，有的教研組要他幫忙購置沙發，他實在不懂人際關係，最後是中科院有一個到美國深造的名額，他爭取到了，1986年到了匹茲堡來學習。

疫情期間唐同誥先生與我郵件聯繫，這位80多歲的老人心態就像年輕人，每天堅持研究他的電腦軟件，一個很有故事的人，這里我與讀者朋友分享唐同誥先生的幾封郵件。

唐同誥先生就日前疫情寫了他對各國對待疫情的感受：德國最清晰，英國最稱職，美國最辛苦，俄國最愛國，中國最愛黨，法國最苦惱，加拿大最愛民。 浦瑛



浦瑛(左一)與唐同誥(右一)等

浦瑛社長：

您也許有興趣知道以下兩個問題：

(一)昨天談到，我來美國後的變化：

(1)沒變化的是：我從不指名道姓地指責別人，特別有不幸的人需要同情。

(2)變化的是：在科技上應該講真實性。

(a)在中國時，一是遵守傳統的過渡的“謙虛”，二是為躲避受害，對其他專業人士的提問，我總說“我搞的理論沒有用處”。

(b)來美國後，中國當時的計算機理論首席科學家唐稚松對我說，你要說真話，不要搞什麼“謙虛”，說自己“不行，無用”。你的老闆會說“你不行，那麼干什么到我這里來？”於是，到CMU大學後，老闆對我說，“你能幹哪方面的工作？”我說的第一句話是“我能幹你叫我干的任何(研究)工作”，不再做讓西方人理解不了的“謙虛”了。

(c)我在專業技術方面的談話，講的都是事實有證據，不能有一點兒假(數學的定理一個接一個。有一個是錯誤的，以後發展出來的一大批定理結果，錯的不可想象)。我提出的這個技術在歷史上是二十一世紀的軟件工程發展主要方向。這些話都在公開的網頁上和出版的書籍上公佈了幾年了，沒人提出異議和挑戰，這在西方每個人可以自由說話的環境下，是很不容易的。其中一個原因是，世界現有的技術距離我提出的理論技術，距離很大，人們想象不出我是怎麼做出此研究成果的。我等待多年後，人們再做出評論吧，不急。

(d)我說此技術和理論了不起，無比地好。希望大家快點學，跟上世界發展的潮流。講了真話。中國人不要把此技術和理論的了不起，理解為我在說“我怎么自己了不起”，很傲慢，想成英雄，這錯了。

西方的方式總是在電視里做廣告說“什麼什麼產品，國際上最好”，這很正常。這種態度大大地促進西方的科技向前的高速發展。

(e)我在網頁里，特別在不少Email里，提到我的這些研究工作，不少人同樣可做，只要他們補充學習那些極端重要的基礎知識。同時，我對學院軟件所，取消了某個對計算機科學發展的重要基礎研究部門的做法，提出僅供參考的異議。

(二)昨天也談到另一個話題：“人與作品的關係”。

(1)人文學的作品反映了作者的社會觀。因此，有歷史意義的偉大的作品，它的作家值得被人們稱為了不起的思想家。

(2)在理工科領域，不適合把科學家的社會觀與專業技術成果過分地合二為一。似乎是技術成果優秀的人，必然應該是社會思想家，把社會責任與要求硬性加到科學工作者的頭上。其實不然，著名數學家陳景濤對社會的瞭

解不多。這些全心投入工作的專業人員，不是也不必是“完人”。

唐同誥

楊老師：你好！

(1)曾經有一位科學家，你暗示我我父親是某單位的留用工程師。以後我注意到他有時判斷不太清晰，確實有點左。

我最近寫給你的信，同時也列上了一些人的地址，勸他們要像楊老師那樣，氣量大思路開闊。

我在2008年前後，我把我的二項研究成果，語言解釋不多地告訴了中國首席計算機理論科學家唐稚松，數理邏輯公認的首席科學家楊東屏，以及復旦大學首次二位命名“復旦大學教授”之一的張根度，我記得他們三位說過，對我的為人和智慧極其瞭解，使得他們立即毫無保留地相信我的成就，使我很感動。

唐稚松希望我參與他的未來的項目，你主動聯繫了軟件所，要我去做去作報告，(當然，從一開始，我在美國的學生以及同事們，極大的參與以及支持我的軟件產品的發展，這些極為重要)。

對的，只有擁有極其深厚知識，又擁有極其高智慧的企務內的科學家，都能很快地瞭解此項了不起成果是可能的，包括張然，至今，中國的軟件領域的院士們，確實沒有一位表示此技術不可能。

我也聽說了，中國只有楊英清院士能緊跟世界潮流，認識到世界軟件發展的方向“自動化軟件工程”。她試過三次技術衝擊，由於人才配備不全，沒達到目標。但是，她的作為也是了不起的。

(2)現在，我集中寫英文版的技術使用說明書，然後才考慮接受投資去，僱傭人員，發展公司。最後，我才能脫身，寫出完整的“理論，方



法、技術”的中型歷史性解答難題的著作。

唐同誥

楊東屏老師，周巢成老師，浦瑛社長：

解決了一些數學問題，它的結論，與誰個人都不關，也都有關。

近代社會主義國家遇到危機，十九世紀早已指出的按需“分配”引出的獨裁。中國累遭相對兵力只有1/10的北部小國的顛覆，內斗與誣告太根深蒂固了。這些事實結論大家與我也知道，與我工作專業無關，就讓有關人員去探討。

我極不愛講話，若有三人在一起，我就聽其他二人聊天，我不願插話。

回憶一下，我從初中起，就遭人誣告說“破壞公物，體育用品‘雙杆’”。我從不去澄清，誰相信就去相信。

我一生就離不開“被人誣告”了。文革中後期，一位大學書記把我揪出成一個晚上的反毛主席的反革命份子。

鄧小平下台時，一位大學書記表現積極，除了帶領學生用大字報批我是“鄧小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基礎”，又硬要每位支部書記上台發言“鄧小平上台，我們都要人頭落地”。我當時聽了汗毛都豎起，實在忘不了。

我實在想不通，在鄧小平過幾天上台後，這些組織罵鄧小平的人都馬上昇官。雙方配合默契，很正常習慣需要。

2015年起申請簽證四年，復旦外事組徵求某系領導意見，他堅持他的89年的告發，說唐同誥曾經確實是“反政府人士”，不同意唐同誥回國，接着他也對某些教師說“唐同誥不會也不可能回國”。(每句話都有人告訴我)，他們奇怪我怎么在復旦大學出現了。更加令美國人難以相信的，那位我很不熟悉只說Hello的系領

導，在最近有人訪問同濟大學時，他對美國人當面揭發“唐同誥去美國時是共產黨員”，其意思是美國禁止……。這件事連我也沒法想通，我作為被揭發受害人從來不在乎，反而揭發人很激動繼續干？

我不是投機份子，與任何政治環境無關，自己的都要靠自己努力勞動：

98年訪問美國到期結束 Carnegie Mell 大學軟件硬件人工智能研究，離美去澳大利亞大學。

95年經長相極為紳士樣的系主任支持我成澳洲公民。

有了身份就去美國，次年96年拿綠卡，二十三年後事業有了眉目的2019年，才申請並成美國公民。

中國人之間的這些莫名其妙的爭鬥為什麼這麼多？所以我感嘆地說“我在這里，Pittsburgh，十幾年我搞自己的科研沒有任何人打擾我，我能靜靜思索，能堅持長時間完成艱巨課題。在中國行嗎？”

在中國和美國一樣，我沒親身經歷不清楚的，不去爭表揚趕時髦地瞎說。彭德懷，劉少奇，江青，鄧小平，

右派份子，我對他們一點不清楚，我不說更不會上台去批判。對周恩來我不清楚，他葬禮日，別人問我，我只說我不知道他好在哪里？為什麼要我去重複別人說周恩來偉大的話？

在專業上與政治言論一樣，不清楚不說。批評也要有根據，也要於人為善，不指名道姓批評。在專業上也是這樣。比如說：理論知識深厚，最令我敬佩的計算機大獎獲得者 Dana Scott，在與我單獨討論“軟件正確性驗證”理論問題時，他極其認真地下結論說“用數學的方法要徹底解決‘軟件正確性驗證’，看來不可能了”(大意)。要用數學符號化的方法，不能迴避“集合論”。

我經歷過用極其嚴密的‘公理化集合論’，探索解決‘軟件正確性驗證’的問題，但是瞭解到：

(1)僅僅接觸的一點軟件的概念，其方法複雜到沒有哪位理論教授，能一看就理解。

(2)小組用了一年，也不知道是否解決了軟件正確性驗證的萬分之一問題？

因而，我完全同意 Dana Scott 教授意見，更明確而讓人有個數字印象。我不能違背我清楚事實而瞎說。

我回答了最近向我提問題的媒體人員說：用原來的數學的方法“要解決‘軟件正確性驗證’一百年也不可能！”

瞭解我的人理解我說的。不必要無關人員都要瞭解。

唐同誥

